

中国兽医史话

金重冶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兽医史话

金重冶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作者根据长期从事中国兽医实践的体会，参阅有关史料和文物资料，概括论述了中国兽医史发展的因素和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提出当前中兽医的医事活动与医疗手段应由治疗转为预防的见解；并用具体事例说明，今后在预防兽病方面，“中西兽医相结合”有着广阔的前景。

这是一本中兽医史的科普小册子，可供兽医工作者和兽医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中 国 兽 医 史 话

金 重 冶 著

*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北京白石桥紫竹院公园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 $5/8$ 字数：32千字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50册 定价：0.17元

统一书号：13051·1065 本社书号：0071

自序

中国兽医史并无完整史料可供参考，因而只好从有关的史料中去寻找。

兽医渊源于畜牧业，但又有别于畜牧；和养马、农业、医学有密切的关系，但又不能把兽医史写成养马史、农业史或医学史。

中国兽医史实际上是中兽医史。

中兽医在治疗内科、外科和产科等普通病方面和中医一样，有极为丰富的临症经验。但中兽医不同于中医的是，中兽医和西兽医一样，医疗对象是动物，并且是指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因此，兽医的医疗手段应当是防重于治。尤其是今天，牲畜由个体饲养逐渐转为集体饲养，医疗手段也应由治疗转为预防，由治疗普通病转为预防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群发病。尤其是中兽医科研工作，今后重点应放在防治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上。

既然中兽医的医事活动和医疗手段将由治疗转为预防，我们就应当用更多的精力，以“中西兽医结合”为指导思想，努力发掘中兽医有关预防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这些都是我写《中国兽医史话》时考虑的问题。此外，也想力求做到言而有据，议论透彻。但是主观愿望不等于现实。现在史话已摆在读者面前，是非曲直只好请大家去评论了。

金重冶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自 序

一、人类进化与畜牧	1
二、畜牧与兽医	2
三、中国兽医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	6
(一)马的因素	6
(二)农的因素	14
(三)医的因素	19
四、《元亨疗马集》的出版	21
五、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及其前期社会的中兽医	24
六、中兽医的医事活动和成就	26
(一)中兽医的医事活动特点	27
(二)中兽医的成就	30
七、现代兽医学和兽医事业	36
八、走“中西兽医结合”的道路	39
后 记	48

一、人类进化与畜牧

“劳动创造人类”。从猿转变到人，劳动是决定的因素。

人类的劳动和其它动物行为的区别，在于创造和使用劳动工具。这从大量出土的石器可以得到证明。中国猿人的化石，最早是“元谋猿人”，距今约有 170 多万年；稍后是“兰田猿人”，距今约为 60 万年；以后才是“北京人”，距今有 20—50 万年。“北京人”已能广泛应用石器，属于旧石器早期；再往后又有“丁村人”，距今约 10 万年。在发现“丁村人”化石时，发现 2000 多件石器，属于旧石器中期。再往后是“山顶洞人”，距今是 5—9 万年。这是旧石器晚期，不仅有石器，还有用骨、角制成的生产工具。根据已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类遗物来判断，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用于打猎和捕鱼的。在我国，到了中石器时期，距今约 1—2 万年，有“扎来诺尔人”，已创造了箭。箭，是打猎的工具，又是武器。

人类从只吃植物进化到吃肉，是一段漫长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人类发明了用火。由于火的使用，缩短了食物的消化过程，这就大大有助于增强人类的体质和智力。正如恩格斯说：“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中国猿人在“兰田猿人”时期已能使用火了。

这样，人类能够依靠因熟食而发达的脑和智力，凭着发音器官和双手进行更复杂的社会性的劳动了。

人类为了经常有肉类食物供应，靠打猎和捕鱼等劳动获得的肉食已满足不了日常的需要，于是逐渐地懂得，可以把捕捉来而一时又吃不完的野兽、野禽豢养起来，留待以后享用，这便出现了家畜（禽）。在距今5—6千年时，即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期，在我国为“仰韶文化”时期，人们不仅能够生产石器，并已能饲养家畜了。根据仰韶出土的兽骨判断，当时饲养的家畜以狗、猪为最多，牛、羊次之，马和鸡较少。在距今4—5千年时，在我国为“龙山文化”时期，家畜中除了狗、猪外，还有马、牛、羊等。但从浙江河姆渡和河南裴李岗和临潼姜寨遗址的发掘来看，我国畜牧业的出现，应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

野兽野禽经过长时间的豢养就开始驯化，并繁殖起来，这样不仅可以得到经常性的肉食，而且还可以得到营养价值极高的乳、蛋等畜产品。

恩格斯说：“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只有发展畜牧业，才能改变以粮为主食的食物构成为粮肉并茂的食物构成；只有发展畜牧业，才能把人类不能吃的饲草变成美味可口的乳和肉。因而畜牧业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需的，是人类保持健康所必需的。

二、畜牧与兽医

人类向前发展了，畜牧业也向前发展了。以农畜中的猪

为例，猪经过人类长期的饲养和选育，它的生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异，猪的头部和体长之比为 $1:6\sim 11$ ，而野猪则为



图1 大汶口出土的猪鬃照片

$1:4$ ；猪肠的长度与体长之比为 $13\sim 16:1$ ，而野猪则为 $9:1$ ；猪每胎产仔数为 $10\sim 20$ 多头，而野猪则为 $4\sim 5$ 头；猪的奶头一般为 $6\sim 9$ 对（我国的太湖猪奶头最多的有十对），而野猪只有 $4\sim 5$ 对。从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猪鬃”（图1）来看，猪形为圆面、拱嘴、竖耳、肥颈、短腿，证明远在四千年以前，我们祖先已向往饲养和现在形

状相似的肥猪了。有人说，这“猪鼻”不象猪，其根据是中国猪的耳朵大，这“猪鼻”的耳朵小。其实猪的耳朵大小，也是选育的结果。根据达尔文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文所载，达尔文于1868年，从巴列特1861年的论文中复制了野猪头和中国猪头图象(图2、3)从中也可以看到野猪的耳朵小于驯化后的中国猪的耳朵。



图2 达尔文复制的野猪头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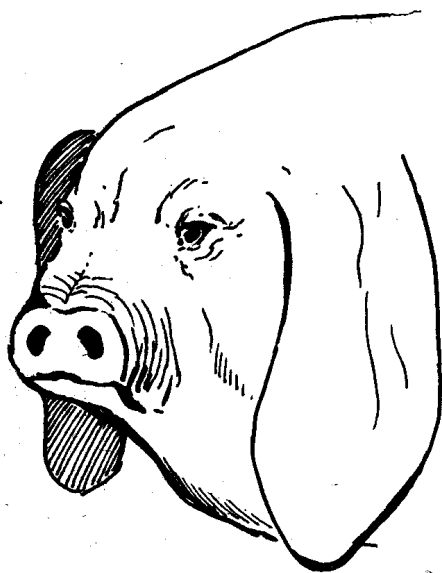


图3 达尔文复制的中国猪头图象

猪在人类饲养下的变异，说明了人类发展史中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产奶量高的奶牛、善跑的骏马、毛细而长的绵羊、能随人呼唤的狗，无一不是人类长期豢养培育的结果。

伴随畜牧业发展的是兽医学。发展牲畜业的大敌是病多与草缺。而克服牲畜

“病多”的兽医学，又是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而发展的。如用石器作生产工具时，人们就用砭治病；知道使用火时，就用灸、熨、烙治病。

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畜养也多了，伴之而来的畜禽疫病也多了。在奴隶社会时，牲畜治病光靠石针、骨针、竹针、金属针或火灸、火熨、火烙。这只能解决一部分“病”的问题，但解决不了“病多”的问题，有时没有办法，只好求“神”帮助。因而求“神”问卜便应运而生。如殷代甲骨上就有贞卜文字，又如古医字下从“巫”作“𠩺”字，后来发明了酒可入药，又改为从“酉”（古“酒”字）作“醫”字，都可以证明。

到了西周（公元前1066—770年），才有兽医这个职称。如《周礼·天官》篇载：“兽医掌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凡疗兽病，灌而行之（行其正气），以节之（节其邪气），以动其气（调动正气使抑制邪气），观其所发而养之（观察病之所在而进行调理）。凡疗兽疡，灌而剂之（内灌药物外破疮疡），以发其恶（把毒排去），然后药之（因病施药）、养之（调理）、食之（加强饲养）”。

在医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医和巫的斗争。这种斗争实际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错综复杂的，也是和上层意识形态及时代的局限性分不开的。人医如此，兽医也是这样。例如《史记·扁鹊传》载有春秋时代名医秦越人（扁鹊）的话：“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可是到一千多年后的元代和明代，太医院还设有祝由科（以符咒治病）。此外，还有同是一个既信神又信医的。如晋代的葛洪（公元281—341年），好仙丹符咒之术，但在他著的《肘后备急方》

中，却记载了《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病诸病方》20个。也有同是一本书，有唯物的内容，又有唯心的成份的。如明代（公元1608年）出版的《元亨疗马集》，一方面强调“急病当针不与针，避凶求吉反为凶”，另一方面却又掺杂“逐日受病”、“放血忌日”等迷信的成份。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批判地继承中国兽医学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才能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三、中国兽医发展的 三个重要因素

中国兽医史的发展，和养马、农业和医学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马、农和医是中国兽医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通过马、农、医三条线的叙述，可以概括地描绘出中国兽医历史的面貌。

（一）马 的 因 素

马，可作为狩猎工具。从《诗经·秦风·驷骎》一诗可以证明。《诗经》产于公元前800—50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经孔丘（字仲尼），（公元前551—479年）的删改，内容虽不能完全置信，但从采自民间的《风》中，还是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概貌。《驷骎》一诗描写的是秦襄公（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东西周之间）狩猎的情形，例如：

“驷（四匹马）骎（赤黑色的马）孔阜（很肥壮），

六轡（缰绳。驾辕马和前捎马各二根缰绳，两边的马各一根，四匹马共六根缰绳）在手，

公（秦襄公）之媚子（爱子），

从公于狩（冬猎）。

奉时（按时喂养）辰牡（年轻公马），

辰牡孔硕（健壮），

公曰“左之”（射马的左侧）！

舍（离开）拔（箭尾着弦处）则获。

游（放牧）于北园，

四马既闻，

辚车（轻车）𨔵（马缰）𨔵（马嚼子。意指车马都闲空在那里），

载豨（长喙猎犬）歇骄（短喙猎犬。意指让猎狗也休息了）。”

狩猎的马，自然也可以作为作战的工具，如狩猎的弓箭同时又是打仗的武器一样。如在安阳发现的殷代车马坑（图4），这种车马，既可狩猎，又可打仗。周代及周以后各代王朝都设有太仆寺；而太仆寺养的马，除供王室狩猎外，主要是打仗用的军马。

在我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2—481年），打仗以车战为主，可见于孙武子（春秋吴王阖庐同时代人）著的《孙子兵法》载：“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80—220年），才出现骑兵，见孙臧（战国齐威王同时代人）著的《孙臧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载：“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这说明在战国时期，战车（戎马）和骑兵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愈往后，骑兵的作用才显得愈重要，如

孙臧说：“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恩格斯也说过：“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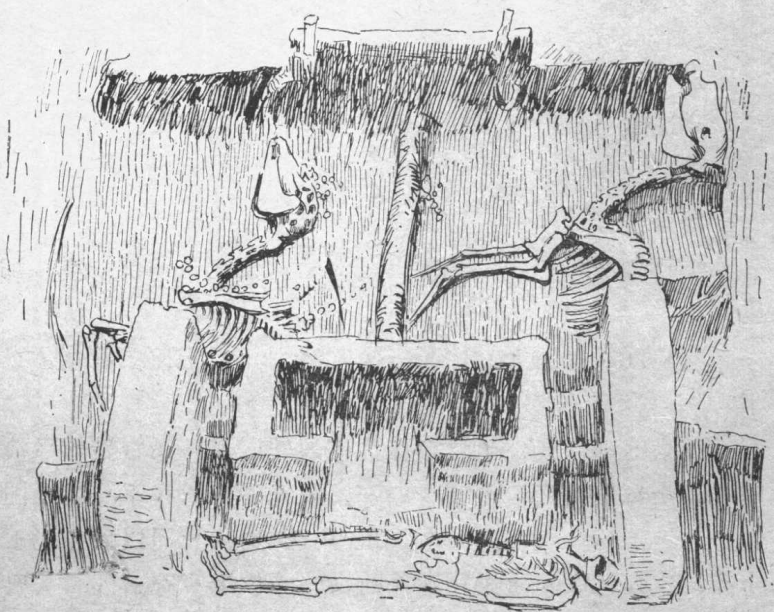


图4 安阳殷代车马坑照片

陕西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秦代（公元前246—210年）陶俑坑，初步估计有12,000平方尺，有武士俑6,000个左右，排列成一个军阵场面，雄骏的陶马，形体大小也与真马相似，以四马为一组，拖一战车，再现当年秦始皇千里驰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的壮丽情景。按秦始皇陵陶俑坑的

艺术水平看，如果秦始皇统一天下仰仗于“离合之兵”的骑兵，要塑造几千个骑在马上冲锋陷阵的骑兵陶俑，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事，但可惜一个也没有见到。足见孙臆这位擒庞涓的伟大军事家，虽然已预见到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但在战国时期的现实生活中却还没有占主导地位。然而，无论是车战还是骑兵，马在历代战争中一直都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唐代杜甫在《高都骊马行》一诗中所说的那样：“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因而马也为历代帝王将相所珍爱。



图5 昭陵六骏之一——飒需紫马像

（此马已被盗，现陈列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现有西安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仅余“什伐赤”、“白蹄乌纯黑”、“特勒骠”和“青骢”四具。）

秦始皇以兵马统一天下，他自然会珍惜兵马之马。汉武帝

帝刘彻(公元前140—135年)爱西域汗血马,着贰师将军伐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649年)爱其生前所骑过的“六骏”,着匠人凿成浮雕,立在昭陵墓后(图5)。

东汉马援将军善别名马,铸铜马作为相马依据。宋相王安石为了战争需要,创“茶马法”和“保马法”。

马是农业重要役畜,又是骑乘驮运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因而也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马粪是一种热性肥料,对土壤有增温作用,具有其他畜粪所没有的特点。当时随着农业的发展,马粪也就日益为农民所重视。东汉(公元前25年—公元220年)的石刻拾马粪图(图6)的出现就是个证明。曹操(公元155—220年)在《对酒》一诗中有“却走马,以粪其土田”句,可见曹操也懂得马粪肥田的作用。



图6 东汉石刻拾马粪图

马有以上所说的多种重要作用,一向被人们所珍视和赞美。有以马的形象作为艺术品的,如唐的彩陶马(图7)、宋的“照夜白昼马”(宋李公麟作);有以马作歌抒情的,如李白的《天马歌》、白居易的《阴山道》;有以马言志的,如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句;有以马说理的,如王充的“马有千里,不必麒麟之驹”句,把马神化为龙,把马居为六畜之首。以马作为故事来传颂的,如《三国演义》中“的卢”、“赤

兔”的故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关于马的谚语，如“马首是瞻”、“老马识途”、“走马看花”、“悬崖勒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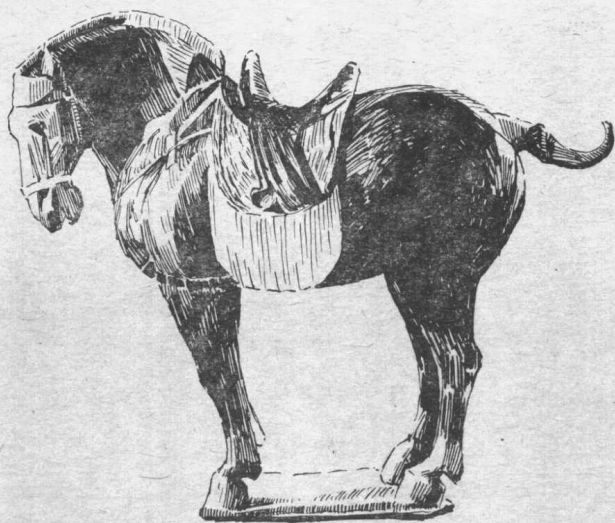


图7 唐三色黑马像

马和人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兽医以医马为主自然是应当的事了。兽医能医好马病，当然也博得人们的尊敬。

医马的技术和著作，留传下来的很少。如《隋书·经籍志》载有《治马经四卷》、《疗马方》、《马经孔穴图一卷》等，均仅存目录，不见版本，因而很难测知当时兽医学术水平。

我们从其他古书中探测到的兽医学术有西汉刘向（公元前48—47年）著的《列仙传·马师皇》篇，其中载有：“师皇曰：此龙有病，知我能已之也。乃针其唇下及口中，以甘草汤饮之而愈”等语，从而知道西汉时的兽医是和现在传统的民间兽医一样按“针不离方、方不离针”的原则治疗的。这

种治疗方法最明显的是明代出版的《元亨疗马集》上的《马患七十二症》的叙述。七十二症中除绝症无法无方治疗外，其余五十九症都是既有药方又有针灸的治疗方法。

到了西晋（公元265—317年），在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中的《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中治马病14方，其中“虫颚马鼻沫出梁肿起者不可治也”句，说的是马鼻疽。“虫颚马鼻”是病因，“沫出梁肿”是病状，“不可治也”是预后。这是对家畜传染病叙述得最早最透彻的记载。

到了北魏贾思勰（公元533—544年）著的《齐民要术》卷六载有医马方30个、医驴方1个，其中“治马患喉痺欲死方”谈到治法：“缠刀子，露锋刃，一直刺咽喉，令溃破即愈，不治必死也”。这个方法用于马腺疫是非常有效的；“不治必死”，是死于颌凹淋巴腺的灼热肿胀。又“治马大小便不通，眠起欲死，须急治之，不治，一日即死”。治法是“以脂涂入手，探谷道中，去结粪”。这是治便秘疝的手术疗法。这些记载下来的方法，一直为后世兽医所遵循。

从隋（公元581—618年）散佚的书籍中，知道有《疗马方》和《马经孔穴图》等。从药方和针灸分别成书这一点，可以推知除了习惯用的“针不离方、方不离针”治法外，也可以单独用针或单独用药来治疗马病的。这对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固守一方一法大有好处。

唐（公元618—907年）的太仆寺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这可以看到唐代养马之盛。到九世纪时，日本有一位名叫平仲国的来我国学兽医，据推测他当时学的主要是医马的技术，因为太仆寺是医马的官办机关。后来，日本有本《假名安骥集》很可能就是唐李石编的《司